

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基本特征及影响

杨运忠

(济南陆军学院 政治理论教研室, 山东 济南 250029)

[摘 要] 作为时代产物的新军事变革,是一场空前的全方位、全领域、全系统的全维革命,已经并将继续对世界军事形态和各国军事战略产生深刻影响。当前新军事变革处于纵深发展阶段。

全面认识新军事变革的基本特征,无疑是把握变革趋势的中心内容和基本前提。

[关键词] 新军事变革;数字化军队;信息化战争;军事战略调整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528 (2005) 01-0026-04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当代高新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军事领域的变革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战争形态从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时代的信息化战争迅速转变。具有信息时代信息战争特点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加速推动新军事变革在更广领域和更深层面向前发展。21 世纪上半叶,将是新军事变革引领世界军事发展的时期。因此,需要准确把握新军事变革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一、世界新军事变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这场世界范围内的新军事变革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时期高新科技与战争的结合,开始孕育新的军事变革。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军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企图用“地毯式”轰炸,截断被称为“胡志明小道”的交通运输线。位于河内附近的清化大桥,是美军轰炸的重点目标。美军出动飞机 600 余架次,投弹 5 000 余吨,损失飞机 18 架,却始终未能将其摧毁。1972 年 5 月,美军首次使用“宝石路”激光炸弹,一次攻击即达目的。此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军队都越来越重视研制和生产这类精确制导武器。在这个时期,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美苏等军事强国基本上实现了指挥自动化。精确制导武器与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发展,为军事变革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技术前提。

20 世纪 80 年代是新军事变革的奠基阶段。1979 年,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敏锐地看到了军事领域悄然发生的新变化,预言先进技术的出现必将引起一场“新的军事技术革命”。他指出: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精确制导武器的大量涌现,必将从根本上打破军队旧有的发展模式,推动和促进军事上发生新的革命。奥加尔科夫的预言,在世界军事领域引起了高度重视和极大反响。此后,新技术研究对军事发展的影响逐渐形成热潮,特别是美国组成专门班子,研究和评估奥加尔科夫提出的新军事技术革命问题。美国军方对新军事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认为,知识是形成毁灭力的主要力量,一盎司硅产生的效能也许比一吨铀还要大。在新军事变革的冲击下,美军提出了“空地一体”作战的新理论,积极发展“爱国者”导弹、“阿帕奇”直升机、联合监视与目标攻击系统等多种信息化武器系统,并积极改革军队的体制编制。世界范围的新军事变革初露端倪。

20 世纪 90 年代是新军事变革全面发展的阶段。1991 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全面反映了作战方式和战争形态的根本性变化,被人们称为信息化条件下的第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海湾战争后,新军事变革不仅在美国迅速发展,而且很快波及其他国家。研究新军事变革,应对新军事变革挑战,已成为全

球关注的重大问题。

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它是人类社会由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变的必然产物。

第一，科技进步的强劲推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军事领域始终是科学技术的新成果首先应用的领域，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引起武器装备的变革。武器装备是军队进行战争的物质技术基础，当军事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形成新的主战装备后，就会推动战争形态和战争面貌的演变。因此，每次划时代的技术革命发生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军事变革；与重大军事变革相伴的，必然是战争样式和战争形态的一次次质变。20 世纪后半叶，人类社会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高新技术革命浪潮，以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以遗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以复合材料、耐高温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技术，以及新能源技术和空间技术等高新技术蓬勃兴起。高新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形成了军事高技术群。军事高技术又促进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大大增强。军事高技术还极大地改变了军队的组织结构，促进了军队编制体制的巨大变革。

第二，战略需求的内在驱动。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战略需求的驱动和战略主体的选择，成为决定军事变革进程和结局的重要因素。作为这场新军事变革的先行者和主导者，美国在两极格局解体后，紧紧抓住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其技术、经济优势，先于其他国家推行军事变革，力图把美军建成世界上第一支信息化军队，为维护“惟一超级大国”地位提供强大后盾和坚强支撑。在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欧文斯和前国防部基本评估办公室主任马歇尔等人的极力推动下，美军的作战思想不断创新，武器装备加速发展，体制编制逐步调整，新军事变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远远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此背景下，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紧跟世界军事发展的潮流，通过不断优化武装力量结构，加大国防投入，加强新型武器装备的开发研制，提出国家新安全构想和新军事学说

等举措，进行军事领域的重大改革。

二、新军事变革是一场空前的全维军事革命

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的新军事变革，是以夺取信息优势为核心，以创新的军事理论为灵魂，以加速组建信息化军队、实现武器装备的信息化和智能化为支点，以军事体系调整为中心的全方位、全领域、全系统的全维军事变革，涉及军事理论、军事战略、战争形态、作战思想、指挥体制、部队结构、军备发展、国防工业等各个方面，其广度和深度是以往历次军事变革所无法比拟的。

1. 新军事变革的基本特征是军事信息化革命，信息优势是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的核心优势

新军事变革，从军事层面上说，是一场信息化革命。信息化之所以成为新军事变革的基本特征，主要是由信息技术运用于军事领域所展现出的独特而强大的效能所决定的。首先，信息技术是新军事变革的支柱性技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导致了以精确制导武器为代表的信息化弹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化、隐形化作战平台的问世。武器装备和军事系统的高度信息化，极大地提高了整个军事系统的战斗效能。其次，信息优势是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的核心优势。当代历次局部战争和世界各国军队建设的实际都充分说明，掌握信息技术，获得信息优势，有效支配信息资源，是当今世界军事斗争的制高点。美军之所以赢得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几场局部战争，靠的就是以超强国力为后盾的超强信息优势。再次，信息战将成为信息时代的主要作战样式。在信息成为重要战争资源，成为军事力量构成的关键要素的前提下，信息对抗技术为信息战奠定了物质基础，信息系统网络化，促进了信息战场的形成，夺取制信息权，成为信息化战争的制胜关键。因此，信息与信息系统必将成为未来战争中打击与防护的首选目标，围绕信息与信息系统的攻防而展开的信息战，也必将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形态。

伊拉克战争是迄今为止信息化程度最高的一场战争。在伊拉克战场上，美军建构了前所未有、功能强大的战场信息化网络。美军此次动用了 70 多颗卫星和 U-2 高空侦察机、“全球鹰”无人侦察

机,构成了绵密的情报侦察网。同时,在导弹巡洋舰上部署了“区域防空指挥系统”,在战斗机上装备了“快速战术图像系统”,在特种部队士兵电脑上安装上了“漫游者”软件,使战场信息化网络能与坦帕(位于美国本土的佛罗里达州)的总司令部、五角大楼和白宫始终保持紧密联系,形成了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一体化的C⁴ISR系统,使陆基、海基、空基、天基的作战平台和各类人员能实时交换作战信息,从而构成了支持各种作战行动的多维信息空间战场。与1991年的海湾战争相比,美国在对伊作战中部队使用的军用通信卫星能力提高了75%,国防信息系统网的通信带宽提高10倍,空中作战指挥中心数据交换能力提高100倍。

信息化战争作为新的战争形态,是对机械化战争的“扬弃”,是信息技术统帅机械化的战争;信息化时代非接触作战是高技术局部战争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基本模式,接触作战对达成战争目的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 创新的军事思想尤其是作战思想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灵魂,先进的作战指导是赢得信息化战争的保证

军事理论和作战思想历来是军事变革最迅速、最活跃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世界军事思想和作战思想呈现出变革程度深、变化周期短的显著特点。越南战争后,美军十分重视超前性军事理论体系的建立,其战斗条令一直遵循实行一代、论证一代、预研一代的原则,形成了当前和长远高度统一的理论体系,使美军始终占据世界军事理论的先导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军打了四场局部战争,在这四场局部战争中,美军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思想都不相同。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空地一体的作战思想;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远距离精确打击的非接触性作战思想;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是精确打击与特种作战相结合的作战思想;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全体体系震慑性打击的作战思想。这说明美国十分注意作战思想的不断提升和变化。

新军事变革的蓬勃发展,对传统军事思想和作战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作战目的由消灭对手趋向改变对手,由歼灭敌军趋向瘫痪敌军,由打垮敌国趋向打服敌国;作战指挥体制由层次叠加的树状结构趋向横宽纵短的扁平化结构,由军种自成体系趋向军种联合指挥;战场形态由线性战场趋向非线性战场,由三维空间趋向全维空间;作战样式由接触作战趋向接触作战与非接触作战相结合,由对称作战趋向非对称作战;作战方式由顺序作战趋向并行作战,由以武器平台为中心趋向以信息网络为中心,由大面积毁灭趋向精确制导打击,由火力制胜为主趋向信息制胜为主;兵力运用由兵力集中趋向系统集成,由单元对抗趋向体系对抗;威慑方式由核武器威慑趋向信息威慑;作战保障由集结式趋向聚集式。可见,军事理论和作战思想,始终是军事变革的基石和精髓。

3. 加速组建信息化军队、实现武器装备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支点

作为未来信息战主角的信息化、数字化军队已经出台和发展。美国是信息化军队建设的先行者。2001年11月,美国国防部成立了由30多人组成的军队转型办公室,统一领导美军向信息化转型的工作。美国陆、海、空三军也分别制定了各自的信息化计划。目前,美国空军装备中70%以上实现了信息化,海军的信息化装备占60%,陆军也有50%以上的装备实现了信息化。这些信息化装备确保了美军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指挥控制的高效顺畅。信息化程度最低的陆军动作最大,正以部队数字化建设为纲领,着手建立“21世纪的陆军”。现已试验性组建了一个数字化旅和数字化师,计划于2005年前后组建一个数字化军,进而实现全陆军的数字化。数字化程度较高的海军在主战舰船上加装先进的卫星通信系统和信息战系统,计划于2020年建成网络化部队。信息化程度最高的空军加速推进空天一体化的建设步伐,通过建立新型的特种部队包括天军来实现转型目标。根据美国陆、海、空三军的转型规划,2010年左右美国陆军将与空、海军联网,到2030年前后,美军将初步完成全军的数字化建设。俄罗斯、日本、印度也在加紧组建信息化军队。

加快武器装备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过渡,是组建信息化军队的物质平台。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军队武器装备系统的主体已经初步实现信息化。其中,

美军信息化程度最高, C⁴ISR (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 系统的一体化建设, 是美军信息战技术准备中的重中之重。武器装备信息化可能带来的最大变化, 是武器系统的智能化和作战系统的一体化。未来的武器系统将具有人类大脑的部分功能, 不仅能自主地对各类目标群进行分析和识别, 还能按其性质排列出先后顺序, 在最佳攻击时机一举命中最有价值的目标。作战系统的一体化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功能上的一体化, 即把过去由几件武器分别执行的作战职能, 改由一个武器系统来完成。如美国、日本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 其雷达系统和火力系统就在功能上实现了一体化; 二是结构上的一体化, 即通过各级 C⁴ISR 系统, 把整个战场上的武器系统和保障系统联为一体, 实现充分的联合与协调。

4. 加快体制编制改革, 形成诸军兵种高度合成, 是新军事变革的重点

信息化时代的军事对垒, 是单元向体系的转变, 单维向全维的突破。随着联合作战的不断提高, 战斗单元的多能化、复合化、一体化、精干化, 将成为今后军事力量合成的基本趋势。因此, 能否组建体系化的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体制, 是赢得信息化战争的重要保证。现代战争是体系对体系的较量, 只有多种力量综合使用、各军种密切协同、各种武器系统优势互补, 才能发挥整体威力。美军从 1997 年就开始着手军队的系统集成建设, 积极推行武器装备“横向技术一体化”建设。2004 年 4 月中旬, 美国国防部正式作出了实施“10—30—30”新军事战略构想的决定。所谓“10—30—30”, 就是在华盛顿作出对某个地区或国家动武的政治决定之后, 美军应在 10 天内进入战斗准备, 并迅速向预定地区集结进发; 此后 30 天内击败敌人; 再用 30 天调整部署, 并为到达全球任何一个地区完成新的战斗任务做好准备。这项被称作“极限战斗力”的战略, 要求美军要具有在一年内打赢五场局部战争的能力。全球化、一体化、机动化、轻便化、多样化, 将是美军体制编制改革的基本趋向。

总之, 世界新军事变革是大势所趋、发展所向, 只有果断地抓住机遇, 勇敢地迎接挑战,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三、新军事变革将对世界战略格局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这场新军事变革无论是对军事领域本身, 还是对世界战略格局和国际安全环境都将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21 世纪世界各国军事战略的优劣和军事斗争的成败, 取决于如何应对这场极其深刻的新军事变革; 21 世纪世界战略格局的走势及构成, 也受制于这场极其深刻的新军事变革。

1. 战略力量对比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

新军事变革不仅促使武器装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还使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倾斜, 造成一种强者愈强的不平衡态势。美国拥有当今世界最雄厚的经济实力、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这样一个高起点上推行新军事变革, 其能量的积累将更加惊人, 与其他国家相比优势将更加明显。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瑙曼说: “由于装备差距不断扩大, 欧洲人和美国人无法肩并肩地在同一战场作战的日子已经临近了。”俄罗斯预测, 到 2020 年, 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基于新军事变革产生的影响, 将使双方拉开数十年的距离。显然, 新军事变革有可能加剧战略力量对比的失衡, 使各国已经存在的差距不仅不容易缩小, 反而有可能扩大。

2. 军事手段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重视

军事手段作为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和最后选择, 其地位和作用历来受到特别关注。新军事变革催生了大量高新技术兵器, 为运用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的, 提供了低风险、高效能、多样化的可能选择。如一枚导弹能携带 228 枚精确制导反坦克子弹, 攻击敌坦克群的能力与 1 000 吨当量的核弹相当。现在, 高新技术使战争的可控性显著增强, 也使军事手段的运用空间进一步拓展。据统计, 冷战时期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年均均为 4 起, 而冷战后年均却达 18 起之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认为, 拥有绝对军事优势是处理国际危机的前提。1990 年以来, 美国对外出兵达 60 余次, 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外出兵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 新军事变革不仅使军事手段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 而且会刺激新干涉主义的进一步抬头, 从而给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带来新的威胁。(下转第 37 页)

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应该将方法和内容二者并重,不能偏废任何一个方面。

“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效性问题的研究之中,不可分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关键和核心是有效性问题。因为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都是以追求有效性为目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重要性的强调,实际上是对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期盼。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也就以如何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效果为存在依据和中心内容。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效果,方法问题很重要。但实际上,无论是从系统论角度还是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教育内容的准确性、科学性是理论教育达到预期效果,并实现教育目的的决定性因素。面对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现象,很多人主张从方法手段上下工夫。但仅仅从方法手段处着眼是不够的。根本问题出在理论的说服力不够,不能彻底地解释回答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以,必

须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进行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才能有效果,这是任何方法手段都代替不了的。如若理论不创新发展,就是方法再现代再活泼也无济于事。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的基本任务高度的原因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提高效果,必须重视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并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总之,“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和任务,它们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始终,统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的其他具体问题。准确揭示“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二者的关系,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江泽民. 论党的建设[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郑端

(上接第29页)

3. 发展中国家战略选择的难度进一步增大

新军事变革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防建设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比如,可以吸收和运用世界军事科技的成果,推动本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新军事变革的经验,使本国的军事改革少走弯路。但是,新军事变革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使其在战略选择上面临两难困境:如果不积极推进本国的军事变革,大力提高国防实力,与发达国家军队存在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如果把主要力量用在军事发展上,就会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从根本上削弱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因此,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如何趋利避害,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将直接关系到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4.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军事强国的战略调整力度加大

新军事变革的浪潮极大地冲击着传统战争理

念,改变了现代战争的面貌,促使各国重新审视安全环境和战略策略,并依据新的客观环境和主观需求,积极主动地进行战略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于维护其霸权战略的需要,已多次对其军事战略进行调整。1992年,乔治·布什政府首先提出“地区防务”战略;1995年,克林顿政府制定了“灵活选择和参与”战略;1997年,克林顿政府又提出了“塑造、反应、准备”战略;2002年乔治·W.布什政府抛出了“先发制人”战略,并将这一战略作为新安全政策的基石写进了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中。这是美国政府继“人道主义干涉”论后抛出的又一个新的理论和政策,是对美国长期奉行的“遏制与威慑”防御政策的重大调整。此外,俄、英、法、德、日等国也不甘落后,为谋求在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也纷纷进行战略调整。可以预见,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各国还会进行新的战略调整,从而促进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新的变化。

责任编辑:刘桂珍